

从布尔迪厄到波德里亚

——媒介符号学理论视角转向的逻辑

胡海

摘要 本文评述了布尔迪厄和波德里亚两位法国思想家的媒介理论,勾勒了法国媒介符号学理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不彻底、矛盾的转向逻辑与历史。指出媒介符号学理论的视角转向揭示了分析性的二元结构思维在理解符号传播的意义过程中暴露出的历史局限。强调对流动、技术以及关系网络的更多关注,能够提供超越结构主义媒介符号学理论历史局限的另一种机会。

关键词 符号学;媒介理论;布尔迪厄;波德里亚;后结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胡海,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四川成都610041

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16.13.005

以符号学为方法的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媒介视角的当代发展,是传播学理论三个主要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为媒介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等社会行为中的意义互动,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工具。^[1]其转变过程,可以从现代符号学在20世纪的兴起,以符号方法为基础的结构主义对存在主义的对抗,以及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反动与补充,发现清晰的脉络。同为法国人的布尔迪厄和波德里亚在这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转向的思潮中,发展出了极具个人风格的媒介理论,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丰富了认识媒介与社会的观察视角。

一、从结构的到沉默的受众

谁是媒介传播活动的中心?过去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媒介和讨论的焦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经历了从早期的传者中心论到1960年代的受众中心论。然而,这两种理论,均建立在一种立足不稳的决定论假设之下,那就是媒介传播应该是一个有中心和边缘的结构,要么是传播者居于中心,要么是接受者居于中心。这种理论假设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来源于早期现实社会中媒介传播过程的结构化存在,另一方面来源于早期研究者们试图以社会物理学的方式简化社会现实的研究范式。这种基于方法论上的一元论研究范式受到了广泛诟病。对此,布尔迪厄认为“将社会学和历史学分开,是一种灾难性的分

工,在认识论上也完全缺乏根据。我所提出的场域理论,其作用之一,就是想消除再生产和转型、静力学和动力学或者结构和历史之间的对立。”^[2]

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后结构主义者的宣言,然而,布尔迪厄却用其极具结构主义风格的社会研究公式:[(习性)(资本)]+场域=实践,为我们描述了当代媒介场域的景观,以及媒介信息制造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权力斗争实践。他将媒介权力归结为媒介受众惯习与所在媒介场域的博弈结果。在他这里,受众不仅仅被自身的惯习所决定,同时,也被所处所在的社会场域位置所决定。虽然按照布尔迪厄的看法,大众传媒的受众有能动的构建个人自我意识的力量,有改变自身资本的途径,也有改变所在媒介场域位置的可能性。

布尔迪厄也为受众的主体性留有余地,但是,他认为媒介的受众在根本上仍旧被媒介信息所结构,媒介控制不仅影响受众获得信息的途径以及获得信息的来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受众的个人惯习,影响媒介受众的自我意识与认同,并改变其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不仅可以控制受众想什么,而且进一步影响他们怎么想,从而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于是,在绕了一圈之后,布尔迪厄又回到了他所反对的决定论立场,而这种决定论是结构主义者所共有的特征。

布尔迪厄宣称,“倘若我们承认符号系统是能对构造世界发挥作用的社会产物,即它们不只是照样反应社会关系,还有助于建构这些关系,那么,人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内,通过改变世界的表象来改变这个世界。”^[3]这样就带来了两种可能性的态度:其一是乐观的行动者斗争,这也是布尔迪厄和霍尔所持有的态度,也就是在媒介信息所能及的范围内,以不同的立场出发,对媒介信息进行对抗性的解读,有可能改变话语权的垄断霸权^[4],从而以自己所在利益群体出发,向对立群体发布反击信息,从而在媒介话语权的博弈中,取得一席之地。虽然当代网络社会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为以往被压制的群体反抗话语霸权提供了一些反权力的机会。^[5]但是,在媒介实践中,符号权力的作用是否真的如布尔迪厄所期望的一样能够提供一条改变社会行为以及社会结

构的道路,始终值得怀疑。因为对话语权的掌握不仅仅来自于符号的对抗,更多的还来自于不同利益群体既有的政治、经济以及在整个话语霸权博弈之中所处的关系位置,例如媒介传播网络中的结构洞。^[6]虽然诸如此类的对抗表象愈发明显,话语权也逐渐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中反复易手,但是最终的资本与权力转化,仍旧与政治强制权力、全球化的资本运作高度相关。

另外一种态度是符号资本以及经济与政治资本的争夺,永远都在矛盾中进行,这个矛盾永远得不到一劳永逸的解决,除非对符号以及符号概念本身进行批判并将其抛弃。这里,媒介符号学的受众理论就转向了波德里亚的“沉默的大多数”:对待媒介信息,受众越是反抗,越是陷入媒介信息的黑洞,因为人无力抗拒符号的束缚和纠缠,无法逃离海德格尔所宣称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同时,布尔迪厄也强调,在对传播活动进行反思性的场域和惯习分析的时候,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确定支撑整个传播活动场域存在的“共识”和“误识”,也就是场域内斗争各方为了特定赌注而进行的斗争,掩盖了对游戏潜在规则的客观共谋。^[7]这些“共识”之中有一个最重要,就是媒介符号的使用在话语权争夺中的基础地位。

然而,面对当代媒介信息的控制权斗争,波德里亚提出一个深刻思考:到底是对符号本体的斗争还是用符号进行斗争?在谈到当代城市涂鸦运动时,波德里亚宣称“这是对代码的报复和转换,是按照代码自己的逻辑,在代码自己的强项上战胜代码,在无参照中超越代码”^[8]。显然,波德里亚背离了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对符号自身的批判,在他的后期作品《象征交换与死亡》、《完美的罪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反抗符号的控制是无能和无效的,任何对抗性的符号行为,例如布尔迪厄出现在媒体上的“参与性对象化”的反击策略,随后带来的是更多的符号暴力和意识形态控制。看起来,波德里亚根本就拒斥符号的作用,拒斥语言的牢笼这样一个概念,“沉默”可以被认为是消极的逃避主义,但也可以被认为是积极地在符号操控最根本的运作机制上,给符号自身以最彻底的打击,对布尔迪厄的“共

识”以最致命的毁灭,是一种“致命策略(fatal strategy)”。

除此之外,波德里亚认为媒介对受众的控制只是一种“客观幻觉”,受众对媒介的反抗同样也是一种“客观幻觉”。处于不同社会需求阶层的群体,由于接触与卷入媒介信息的不同,会对媒介信息传播的现实效果进行不当归因,将多种社会因素影响下形成的后果视为自身主体能动性的产物。在认识论的层面,这种“幻觉”来自人类理性对世界主客体强制性分割的二元论看法,这是结构主义乃至西方所有体系哲学和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必须彻底地加以摒弃。话语权的争夺、拟像的存在价值,只是消费社会的符号游戏,“无论怎样,这都是传媒理性的结束,政治理性的结束。”^[9]至此,波德里亚终结了布尔迪厄的结构主义的能动的和被动的受众观,终结了媒介效果各类学说,在他的眼里,不仅媒介世界根本就是一个幻觉的世界,所谓“真实”的世界同样也是一桩意义退场的“完美罪行”。

二、真实的退场与意义的消失

“我们不会给世界的虚无增添什么,因为我们属于这个世界。反之,我们也不会给世界的涵义增添什么,因为它没有意义。”^[10]这就是波德里亚的立场。符号学方法论所处理的问题,是世界的意义以及意义的功能。波德里亚比布尔迪厄激进的是在他看来,以媒介文化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在经历了剧烈的解构运动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意义荒芜的沙漠以及真实的狼狈退场。对于真实与非真实的问题,在拟像与能指泛滥的当代社会,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假命题。

在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中,符号被看作“能指”和“所指”的连接,能指和所指连接的任意性为对抗符号权力提供了机会,处于社会权力不同层次的行动者往往利用这种任意性制造对抗的话语体系,从而抵抗来自于他者的符号权力的压制。这也是布尔迪厄颇为认真对待的“参与性对象化”行动策略的逻辑起点。在这里,大众媒介及其代言的群体所生产的符号,在“值得玩”的前提下,能够产生相应的传播效果,“玩”什么,

怎么“玩”,依然遵循着真实的和意义的原则。在这些规则之下,意义依旧能够被有意识地制造出来,并通过大众媒体的生产、交换过程,完成看似严肃的话语权斗争。这个过程能够得以顺畅运转的社会条件基础是传播过程的单向性,以及媒体符号与现实之间的一个看不清楚但是又稳定的深度对应关系。

然而,意义并不是一个整齐包装在符号里绝对不变的概念,相反,意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11]。在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符号编码和解码的话语霸权,被信息传播的多向性打破,符号实现了自身的快速流动与表意行为的流动,意义在表意行为的变化中不稳定地流动。在拟像的第四个阶段,符号不再与真实/现实有任何关联:它纯粹是自身的模拟物。^[12]符号成为了被消费的对象,同时也制造着消费的欲望。深深懂得市场营销技巧的媒介的控制者,不仅仅知道如何迎合大众的口味,也制造出人们的爱好和娱乐兴趣,人们只要想要,就拥有无数的选择,在这种“饲养”模式下,人们的主体性逐渐丧失,甚至人们意识不到这个过程。于是,媒介传播的符号成为了被消费的和“游戏”的商品,狂欢的能指,成为了不断流动的意义洪水,淹没了所指,企图传播的意义被大量流动的符号所消解。媒介在传播中消解意义,媒介不再是意义的传递者,而成为了引发符号自身内爆的场所。波德里亚声称自己是“二十世纪后现代性二次革命”的一部分,而这次革命“是意义解构中一个巨大的进程,相当于早先的表象解构。任何依靠意义活着的人都会因为意义而死亡。”^[13]

波德里亚在他著名的《拟像的三个秩序》中写到:“西方思想不能忍受,从来都不能忍受意义的空无,不能忍受非场所和非价值,它必须有一种场所论和一种经济学”^[14]渴求意义,对无意义会产生无限的恐惧,人总是需要有一点点什么东西。而不能容忍没有什么东西。西方传统的理性逻辑最矛盾的命题出现了:可以对有进行否定,但是不能否定空无。波德里亚触碰到了理性精神最敏感的神经,无论是西方的基督还是神话、巫术、迷信乃至社会思潮中的各类主义,主体

总是渴望意义的,总是欲望有一种引领精神方向的历史感和未来观。因此,在这种需求的支配下,语言对现实的改造作用才具有了长久的稳固基础。然而大多数人无法超越语言的诱惑,因为用语言来思考超越语言,本身就显得很荒谬。对波德里亚来说,“沉默”是多数人能够达到的极限,“沉默”策略对符号的攻击,是对意义流动能力的彻底摧毁。面对他人“形而上学”和“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批判指责,波德里亚认为那是一种符号暴力,一种权力的控制,所谓“辩证法”也只是语言牢笼中的一种价值认同,并不具备先天的合法性,“游戏”才是超越语言之后的游刃有余。

波德里亚借用了老子和庄子的寓言故事,阐释了他的本体论,那就是世界本来自空无,而意义是社会的、后天的产物而非人类固有的属性。只是在古典和工业时代的仿造和生产制造的社会环境下,人对物的依赖使得真实与意义显得尤其的重要,并且古典时代和工业时代的思想型,尚不能为人类认识真实与意义的本质提供逻辑支持。但是到了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当下社会,在媒介拟像以惊人的速率,铺天盖地地充斥人类各种感官的时候,真实和意义才真正开始出现了问题,或者说人类才严肃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波德里亚不仅终结了真实问题的论争,将真实和意义还原为空无和多样的可能性,使得真实和意义成为一个开放的过程,任何真实和意义都成为了真实感和意义感。这个主题同样也是德里达这样的后结构主义者共同关注的问题。而且他向东方古典思想的探寻,也反映了西方理性思维方式内部固有的矛盾,在符号内部寻找真理与意义是此路不通的,这条路到了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就已经走到了尽头。波德里亚似乎找到了出路和希望,他的坐标落在了东方,但遗憾的是生命的规律阻止了我们看到他进一步的探寻。

三、从区隔到边界的取消

划定边界是权力的保护机制,在社会场域,边界则是后天的权力结果,是权力欲望的需求。文化消费是社会各阶级之间与同一阶级的成员彼此之间的主要斗争场域。布尔迪厄认为“社会

主体由其所属的类别而被分类,因他们自己所制造的区隔区别了自身,如区别为美和丑、雅和俗;在这些区隔中,他们在客观区分之中所处的位置被明白表达或暗暗泄漏出来。”^[15]

符号消费在社会身份认同中发挥了重要的区隔作用,在对某些物品进行消费的时候,表明我们与那些消费同类物品的人是相似的,而与那些消费其他物品的人是不同的。从品味出发,扩大到社会阶层不同的身份认同,符号所起的作用就是在社会人口中制造阶层和阶级,并将不同阶级之间的身份变化,体现在主体符号消费的表象变化上。阶层、民族、国家等等身份认同和同一性,可以通过符号的认同和使用来加强,也就是说,在布尔迪厄看来,符号的作用,尤其是现代媒介符号的操控,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就是制造和强化区隔。因为不同的媒体信息、符号表象,代表了不同的阶层身份以及利益诉求,这些信息和符号通过大众媒介散布到大范围的人口,认同者将强化其身份认同以及从媒介信息和符号表象的消费中获得认同感以及愉悦感,并将此行为视为同“自己人”的互动交流。例如宗教媒体所起的作用就是巩固宗教的信仰以及认同,宗教成员从这种“自己人”媒体中获取信息,掌握动向,并以获得的信息来指导其社会行为。用象征符号进行社会身份的再生产,是一种在各个社会中都存在的现象。不同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人们用什么来做符号是不同的。

更重要的是,人们往往利用这种消费差异来构造并生产、维系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特别是高等群体与低等群体之间的界限。人们所消费的符号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区隔与差异,文化消费同时还生产、维系与再生产了社会区隔与差异。因此,布尔迪厄媒介符号学的任务是分析分层的社会等级与统治系统,如何在代际间进行维持与再生产而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抵抗与有意识的识别^[16]。然而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媒介拟像以几何级数的增加,数字时代的到来打破了这个区隔的稳定假象。尤其是互联网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阶层、民族以及国家的边界日趋模糊,乃至有被取消的苗头,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博弈,便存在

这样的状况。波德里亚观察到,内爆导致模拟时代的到来,因为电力时代媒介的强大制造和传播功能,使得整个社会被媒介信息所笼罩,这表明真实已经成为过去,统治世界的是“仿像”,对真实的模拟开始成为人类意识的“超真实”,成为人们认识事物所依赖的基础。边界之间出现了断裂,现代社会所确立的种种边界消失:仿像和现实、信息、政治和娱乐、高雅和通俗等边界被取消,区隔的打破也反映了权力格局的变革。

布尔迪厄认为传播总是符号携带意义流动的关系性活动,德里达对言说和书写关系二元对立的批判则提示了“在场”和“不在场”的关系同样重要。而波德里亚认为在媒介符号无缝传播的社会层面,所谓“虚拟社会”这种人为的二元对立和分析性的称谓,并不能把握现实社会中不同场合关系的同一性。这种逻辑思维方式在工业社会中存在着强大的生命力,曾经推动了技术和科学的发展,但其分割、线性、主客二分的思维特征,是造成工业社会大量异化、区隔、不平衡的思维方式根源。这种便利、权宜之计的思维方式在以信息为中心的网络社会中,已经遭受到了强烈的挑战。

因此,波德里亚并不认为现实与虚拟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之间,存在着符号交换的互动,它们之间在拟像的强大作用下内爆,界限在取消。一切都是“超现实”的,波德里亚认为现实与虚拟这两个概念也存在着问题,媒介世界就是现实而非所谓的真实世界的表象。实在的边界与虚拟的边界在何处?波德里亚否认这个问题的合法性。在《代码的形而上学》里波德里亚写到:物理学证明同一性并非只是一种公设——同一性存在于物体之中,因为有“两个原子处于相同量子状态这种绝对同一性”那么,这是约定还是客观现实?^[17]波德里亚提出了严肃的疑问,在他看来,区隔以及同一性的问题,只是一种约定而非现实存在。

四、超越的可能

超越“语言暴力”和“拟态环境”的控制和斗争,是否可能?这是布尔迪厄和波德里亚符号学

媒介理论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布尔迪厄宣称自己的社会研究和实践致力于消除和调和结构与行动、客观与主观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并提出“实践”的和“反思”的社会学这一解决方案。布尔迪厄所推崇的关系性分析,即后来的社会网络分析思路,的确为深描符号权力场域提供了一种叙述性的方法。然而,就如同描绘地图一般,清晰完整地揭示符号权力场域中的关系位置,并不代表这张地图能够提供批判性的行动策略,行动者的主动策略依然建立在符号意义理论基础之上。因此,也并不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可以通过“参与性对象化”,改变权力场域的格局。

不过,波德里亚的思想也显得并不那么有新意。在他走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后,波德里亚希望寻找一劳永逸的“解脱之道”,用彻底的后现代“革命”解构意义与表象的努力,更像是在向存在主义前辈和东方的佛陀模仿学习,然而却缺乏了佛陀对“相”的批判实践。在麦克卢汉那里,借用“内爆”和“外爆”的概念,波德里亚获得了对技术本身的兴趣。有趣的是,面对指责,在《论虚无》里,他不得不利用了同布尔迪厄一样的符号实践道路:用语言来反击语言。因此,这与他所宣称的激进的后现代立场显得有些自相矛盾。虽然如此,波德里亚的努力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后继思路,那就是从西方语境中跳出来,向东方寻找灵感。由此,可以看出,从布尔迪厄到波德里亚的理论转向,代表了媒介符号学理论从结构主义走向后结构主义的不彻底的矛盾过程,也提供了一幅东西方思想隔空对话的有趣场景。

然而,是“谁”在超越,是置身于社会斗争中的群体?还是出离、游戏的自觉个体?只有前者中有出离和游戏倾向的人会试图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后者则不会,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并不需要超越什么。布尔迪厄的《区隔》所述语言制造的文化隔膜及解决之道,同样也并不那么原创,早在中国古代便有了答案:“上堂: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才有语言是拣择,是明白。’……问:‘至道无难,唯嫌拣择。如何是不拣择?’师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18]

在语言中超越语言,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超越之路。在语言的逻辑中谈论超越的悖论,似乎也是一个不可能的荒诞故事。波德里亚和布尔迪厄同样试图激发社会人的主体能动性,但两人走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不过,两人所共同具有的超越的悖论是:在符号逻辑体系中试图超越,将会陷入控制与斗争的循环圈。因此,西方的后结构主义媒介理论对于结构主义的媒介理论来说,只是一种“老瓶装新酒”式的语言游戏,并不可能触及到问题的来源。“超越”是一个静态中才能存在的概念,而“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有机体。在活生生的生活河流中经过,流动性自身已经消解,超越了布尔迪厄和波德里亚的问题。在一个个流动的当下体验中,自然地超越,人人都有超越现实的可能性,这是佛陀提供的道路。当然,对于群体来说,可能依旧是一个问题。

在网络社会,符号的数量与流动速度的增长使得个体“浸染”的符号与意义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比过往更深陷其中,让我们自己暴露在他人越来越多的意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之中。^[19]媒介环境的变化导致了结构化的传播场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符号信息、意义选项过载,一种非结构化的流动的传播场域正在信息技术的催化下形成。信息、物体、人的加速流动,正在改变争夺意义的权力版图。在信息技术铺就的道路上,社会网络的密度和广度呈指数增长,传播网络的结构洞形成和消失同时加速进行着,这些正在发生的进化过程,为不同的社群赋权,提供了主动改变自身权力位置的机会,也提供了更加流动的、当下的、碎片化的个体与社会生活体验,这种体验不再牢固的建立在缓慢的社会变化、历史存在之中,那正是“语言暴力”和“拟态环境”存在的社会现实基础。

信息、身体、物体的流动、周期加速缩短的技术增长以及由技术所触发的进化中的传播与社会关系网络,也许才是改变符号权力场域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控制流动的度和量,封锁技术的自由扩散,以及控制关系网络的结构洞,成为

了当下正在发生的权力场域争夺的焦点。倘若对流动、技术以及关系网络投入更多的关注,或许能够提供超越媒介符号学理论历史局限的另一种机会。

参考文献

- [1]陈卫星.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J].国外社会科学,1998(1,2).
- [2]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26.
- [3]皮埃尔·布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4.
- [4]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5]Castells M.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counter-power in the network socie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7, 1(1): 29.
- [6]Burt, R.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 [7]皮埃尔·布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8.
- [8]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15.
- [9]让·波德里亚.完美的罪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05.
- [10]让·波德里亚.完美的罪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4.
- [11]Fiske, J.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M]Routledge. 2010.
- [12]Baudrillard, J.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M]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 [13]Baudrillard J. On nihilism[J]. On the Beach, 1984, 6(Spring): 38-39.
- [14]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353.
- [15]Bourdieu P.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6]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17]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86.
- [18]普济.五灯会元(卷4,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202-203.
- [19]Gergen, K.J. The saturated self: Dilemmas of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life. [M]Basic Books. 1994.